

荒谬时代的人性悖论

——论小说《后悔录》的反讽修辞

柳应明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叙写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30年中主人公曾广贤从禁欲时代到欲望时代的失败史。因为两个时代的特殊性,《后悔录》创设了一系列悖论情境,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反讽效果。曾广贤身处禁欲时代却敌不过身体伦理,到了欲望时代却又坚守道德伦理。这样,他向善的愿望就与遭罚的结果形成强烈对照。

关键词:《后悔录》;悖论;反讽;修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4-0060-05

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叙写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30年中主人公曾广贤从禁欲时代到欲望时代的失败史,其内容可以用主人公的话来概括:“我这辈子好像都在挖坑,都在下套子,挖坑是为自己跳下去,下套也是为了把自己套牢”。对于这篇小说的内容、意蕴、思想意义等已有众多的评说,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因为小说叙述的是荒诞时代的人性劫难,反讽意味特别鲜明,而这方面的评论却未看到(直接论东西小说反讽的文章,笔者只见到一篇《在荒诞中寻找出路:论东西小说中的反讽》,文中举了《后悔录》中的一个语言片断^[1]),所以笔者在此要论的是小说的反讽修辞艺术。

反讽现象古已有之。“反讽(Irony)一词源自希腊语‘eironeia’,原意为‘佯作无知者’,指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他明明了解事物的真相,却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有意说傻话,最后表明这些傻话又是正确的,从而使对手服输。”^[2]¹⁷⁹而《贝特福特文学与批评术语词典》的解释是:“反讽是外表或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或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反讽概念还进一步被运用于事件、情境以及一部作品的结构元素,而不局限于话语陈述。通常采用反讽是为了对处于‘混然无知’状态的听众或读者进行一种‘暗示’。……说话者或作者

甚至可以运用反讽作为表达的一般模式而不是用来作不连贯的反讽性陈述。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一个作者的语调是反讽的。”^[3]这个概念从文学角度对反讽进行了阐释:反讽不仅是语言上的“口是心非”,而且还包括了文学表层叙述与深层意义之间的矛盾;反讽不仅可以作为一种修辞格来使用,还可以作为一种结构元素甚至作品的基调运用于文学作品中。

李建军梳理了众多概念后,将小说中的反讽修辞界定为:“它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4]²¹⁷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构成反讽的三个要素,其中第二个就是“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对比”,并认为“几乎每一种反讽都是在具有反对性质的两种对立因素的对照中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反讽。”^[4]²²¹⁻²²²吴文薇则认为:“反讽是多元视境的产物……在常规认识背景和框架中还显得合情合理的事象,一旦变更了认识背景和认识角度,原有秩序中确定的因果联系会突然显现出明显的悖逆和漏洞,正确的变为荒诞,神圣的变为可笑,反讽便由此诞生。”他还认为,“当代小说中的反讽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言语反讽,一种是情境反讽,它们分

收稿日期:2011-10-10

作者简介:柳应明(1969-),男,江苏东台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别存在于小说的叙事体式(语调、态度)和叙事结构之中。”^[5]由此可见,反讽作为修辞,其运用的情境应包含着对立、相悖的因素,即悖论是反讽的前提,没有悖论的存在,反讽效果将会大大减弱。

悖论(paradox),又称诡论、吊诡,本是一种修辞方式和语言技巧,指表述上的矛盾。但在20世纪成为英美新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克林斯·布鲁克斯认为悖论不仅是语义陈述上的特征,而且是文学结构上的特征,特别是诗的结构上的特征,并将其定义为“悖论就是诗歌和结构的各种平面不断地倾倒,产生种种重叠、差异和矛盾。”^[6]^[11]而悖论在文本中最本质的作用则是:“以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以求取得一种意在言外的效果。”^[7]^[185]

根据上述看法,笔者认为《后悔录》的反讽不属于言语反讽,而是情境反讽,它的整个叙述基调都是反讽的。它的叙事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于90年代。因为两个时代的特殊性,作者创设了一系列悖论情境,把主人公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反讽效果。

一、禁欲时代与身体伦理

福柯认为,对身体和与之相关的性的规范,可以理解为是在生存艺术和自我关注的艺术日臻精致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的伦理和自我塑造为自己性行为的道德主体的方式^[8]^[538]。在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政治和革命伦理以其特有的方式对身体加以规范,与此相冲突的行为均被视为肮脏、龌龊。就这样,历史强行剥夺了人们的身體欲望,欲望成为非法的。

《后悔录》的叙事正始于60年代中期,用余华的话说,“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9]。小说中,“我们除了上学,开批斗会,就是搞大合唱,课堂上没有关于性的内容,就连讲话都很少涉及器官。”性的知识只能来自动物——两只花狗的交配。男女两性的关系只限于夫妻之间,而且是说不得的,它只能是黑暗之中的无名享乐!否则就是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这样的时代,性不可能得到正当的表述,性只能是一系列肮脏龌龊的勾当!所以围观两条花狗的性事被校长赵万年认为是“公开展示色情”,“是低级趣味,是要挨批斗的。”他还教育妹妹赵山河:“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

然而,身体伦理的力量似乎更为强大,“文革”在话语上对身体的禁锢根本无法抑制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脑袋是可以被意识形态作用,直至异化的;而身体则很难,它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界限和反映方式,比如,它的痛,它的快乐,它的满足,或温暖,或寒冷以及人内心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通过身体传达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难改变它,除非暴力,才可以摧毁它。”^[10]因此,即使在视性欲为洪水猛兽的年代,身体的欲望虽然在外在形式上被压抑,但内心的欲望渴求却很难因此而有所减弱。欲望总会在日常生活中以某种方式得到宣泄,或以扭曲的形式在被压抑的缝隙里生长出来。政治、革命伦理似乎只教育好了赵万年、吴生与“我”这几个人,其余的人则遵从身体伦理的法则。正如王小波所说:“在非性的时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11]^[51-52]实际上,《后悔录》在“禁欲”的主题限定下充满了色情意味。性惩罚、性变态、性游戏、性骚扰、偷窥、梦遗、意淫……,“无性”成为了“性”的无所不在。

花狗的性事引来众人的围观,除了赵万年和吴生,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件乐事,“都露出了笑容,好像要把存款在这一天里连利息都花光。”在花狗的引逗下,十年没沾过“油荤”的父亲曾长风欲火中烧。他恳求自己的妻子遭到拒绝;他恳求从前的管家借用老婆也被拒绝;他喝大量的凉开水“久久地冲凉”,想用冷水浇灭自己的欲火,可是都没有成功。最后他还是睡到了赵山河身上。中学同学池凤仙则对“我”以身相许:“广贤,我们都不是学生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主了。”可是“我”却大骂她“流氓”。池凤仙后与于百家在下放地的草垛里野合。“我”的同事赵敬东爱慕表姐张闹,却不敢表白,只能把欲望转移到狗身上。他为狗取了一个与张闹一样的名字,最终发展到与狗交媾。“我”本来和母亲一样也对性充满了不洁感,进而发展到对一切正常的性行为的厌恶、恐惧与逃避!但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我”并不具有肮脏的思想,却禁不住本能诱惑和周围男人的鼓动而饱受欲望的煎熬,对美貌的张闹想入非非,终至入室“强奸”。

因为身体伦理的满足是以非常态方式得逞的,所以这些欲望主体都受到了“惩罚”。而这种“惩罚”最终是要落实到身体上的,因为“革命,在表面上是改造思想,最后达到的效果却是改造身

体,思想是通过身体来体现的。”^[10]于是父亲曾长风的下身被打肿得有小碗那么大,池凤仙和于百家被批斗,赵敬东在要批斗他的传言中自杀,“我”被关押两年,判刑八年。

二、欲望时代与道德伦理

身陷囹圄八年(加上判刑前的被关两年,共十年),曾广贤终于出狱了。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世界转变得如此之快。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9]。他的周围,一切都不一样了:性已经成为诱饵、投机的资本、待价而沽的商品!甚至是打击对手的武器!再也没有人把性当成一个神圣的、不可亵玩的私密领域。正如有人说的,“福柯关注的历史,是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服的生产工具进行改造的历史;那是个生产主义的历史。而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12]46-47}

时代变了,而我们的主人公曾广贤却变不过来,禁欲时代惨痛的教训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仍然恪守着自己的做人准则与道德底线。他把爱情与婚姻看得非常神圣。他准备跟真爱自己的两个女人(陆小燕和张闹)中的一个结婚!可是他心有余悸!他万分小心谨慎,为求绝对安全而一再拖延婚事与性事!结果把两个女人全错过了!

从出狱的那一天起,曾广贤即开始了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艰难的心灵突围。他对自己发下毒誓:“就是在男女关系上别再犯幼稚病,别又栽在身体上。”出狱第一天见小燕,小燕高兴地拥抱他,他却无动于衷,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的爱慕对象是张闹,为她遭受冤狱,也曾对她恨之入骨,但仍抵挡不住她美貌的诱惑,置小燕的热情和帮助于不顾,他的天平向欲望倾斜,最后仍选择了与张闹结婚。小燕负气离他而去,曾广贤又一次痛失可能会拥有的幸福生活。而曾广贤与张闹的“婚姻”无性无爱。尽管张闹曾多次主动诱惑他行房,都被他以种种理由拒绝,他的理由是要注意形式!讲究情调!这表明他对婚姻大事、对第一次性事多么看重。

可欲望的时代对曾广贤的道德守护开了一个

大玩笑。他不知道,在一个消费社会,“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13]144}张闹正是这一时代的弄潮儿。张闹是一个漂亮到“找不到恰当的字来形容”,看上去连女人也会心动的,会跳芭蕾舞的女人。她也曾是一个纯洁、天真的少女,因为漂亮而招惹不少是非,赵敬东因暗恋她而变态,曾广贤因想她而入室“强奸”。她陷害曾广贤,是因为对自己身体的无知,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可作为被害者,她也受尽了冷眼和屈辱:被人骂骚货,不让演吴琼花,不让跳芭蕾舞,年华老大嫁不出去……十年后,她愤激地对曾广贤说:“假如我知道要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我根本就不会喊救命,哪怕是让你强奸了,也比受他们污辱好一万倍。”于是生活在欲望时代的张闹变了:她以美貌为资本,俘获男性,满足欲望,获取利益。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与任意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她曾毫无愧色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可以同时爱几个人。”她认为:“睡觉归睡觉,结婚归结婚,我可以跟许多人睡觉,但他们不一定是我的丈夫。”她引诱曾广贤不成,就弄来一张假结婚证把曾广贤牢牢拴住;曾广贤拒绝在没有情调的氛围中与她行房,她就与于百家上床;曾广贤要求离婚,她拖住不放,最后讹诈了八万元,并最终葬送了曾广贤与陆小燕的爱情。张闹的变化固然是被消费时代的环境熏染,但笔者以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闹的报复心态:作为被害者受到如此屈辱,何不破罐子破摔,就做一个坏女人!于是,在一个价值崩毁的消费时代,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张闹的行为与曾广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视身体为捞钱的资本,将道德戒律践踏得粉碎;一个视身体为罪恶的渊薮,自觉臣服于政治说教的规约。两人的结局也判然有别:张闹如鱼得水,无往而不胜;曾广贤处处碰壁,不断与幸福生活擦肩而过。

三、向善的愿望与遭罚的结果

人类都有追求真善美的美好愿望,但在具体行动中常常因为认识的局限性、行动的盲目性等

原因导致与最初的美好愿望恰好相反的结果。在创作谈《三年一觉后悔梦》中，东西对他的主人公作了这样的评价：“主人公曾广贤不停地‘如果’，‘如果我不这样，如果我那样，那我就会……’有了这样的句式，不得不迫使我对他的来路进行回望，仿佛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错的，而没选择的爱情或者生活则有可能是对的。看上去他有点耍赖，但对错误的全部承担以及从不从客观上找原因，使他的耍赖变得令人同情，而且还有些可爱和可贵。”^[14]291-292

读过小说后，我们都会感到曾广贤是“可爱和可贵”的，在他的半生历史中，除了那一次冲动的人室强奸外，他都在“行善”：做一个诚实的、正直的人，维护做人的良知、人格的尊严与心灵的高贵。可是他努力的结果是，既伤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的幸福。

禁欲时代的曾广贤奉行的是异己的、机械论的道德观。社会、学校、家庭的教育，使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地完成了对少年曾广贤的规训。受母亲的影响，曾广贤大脑中充斥着“革命”、“纯洁”等词汇。他遵从父母的教诲，听老师的话，努力做一个真诚的、纯洁的、“思想健康”的人。他揭发父亲，鄙视母亲，大骂小池，承认告密；而结果是父亲被整得致残，母亲羞愧而死，妹妹失踪，小池离他而去，邻居、朋友视之为异类，真正是家破人亡，众叛亲离。表面上看，这一切都缘于曾广贤的那张“破嘴”，他还曾为此去“封嘴”。可语言的狂欢一次次要冲决而出，语言的暴力不仅直接导致了他的家破人亡，后来也是由于他传递错误的信息而直接导致了好朋友赵敬东的死，把张闹和于百家的事告诉了小池而毁灭了小池的生活，告诉父亲要收回仓库致使父亲心脏病突发而昏迷。

当曾广贤意识到嘴巴成为所有灾难的根源时，他反省道：“千错万错都是嘴巴的错。”于是他选择了缄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缄默使他被白白关押了两年多。他的“强奸”案发后，出于自尊，不愿回答公安的提问，故意撕烂嘴巴，咬破舌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其结果是，他的提审晚了两年零三个月！

曾广贤为什么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总有一种说出真相的冲动？这难道不是长期的教育已然深入骨髓，他洁白的潜意识中容不下任何杂质。同时也表明，在一个语言编织的世界里，沉默的抗争也成为不可能。因为人一旦被抛入这个世界，

就无法逃遁语言所构建的秩序，个体的存在无法穿越语言的牢笼，个体不是“言说”的主体而成为“被言说”的客体，语言的暴力把虚弱的个体命运撕裂为碎片^[15]。

欲望时代的曾广贤恪守的是国家的法律（对非法同居的恐惧）和道德的底线（对乱伦的禁忌），用前半生得到的教训对付后半辈子！结果是一再与似乎唾手可得的幸福失之交臂，以致人到中年以处男之身变成完全的性无能者。他与陆小燕有多次同居的机会，可他害怕那是非法；张闹更是多次引诱他，投怀送抱，他却要等拿到结婚证，做合法夫妻。就这样，昔日的欲望禁忌与惩罚以异样的形式延伸内化到了曾广贤现时的生活，使他失去了唾手可得的性爱机会。两个女人都离他而去后，他曾看上按摩院的领班，可当他们刚要上床时，他恍惚看见了对方手心有一颗痣，而他只要“看见女人们的右掌心有黑痣，就觉得她们要不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的女儿。”因为这个，他没敢过一次性生活，他害怕自己的手摸到自家人身上。最后，曾广贤在女性面前，身体陷入窘境，内心有欲望，而身体没有欲望，内心已经成为身体的魔障。

值得一说的还有“我”的母亲吴生。吴生是最坚定的性禁闭执行者，她认为高尚、干净等语词高于身体伦理，曾广贤天生的卷发、曾芳右手心上的黑痣也被她视为身体不洁的象征。接近十年的时间内，曾长风即使用借钱的口气，也未能打开她的性禁闭，她质问丈夫：“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吴生让自己的身体去装饰并实践了高尚与干净的理念，使自己顺从于对身体欲望的厌恶之感：“我用了十年，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革命友谊，就请你离我远点，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吴生已然修炼到圣徒的境界！而如此纯洁的女人，其结局如何呢？她花费十多年树立起来的崇高圣洁形象因何园长的猥亵而毁于一旦，儿子对她吐口水，最终落得以身饲虎的下场！一个最符合当时价值标准的人却最快走向死亡，以最悲惨的结局告终！按理说，“犯规”的是何园长，受惩罚的也应该是他，为什么却是她这个受害者呢？

有人从哲学角度对反讽作阐释，“卡尔·佐尔格断言，真正的反讽‘始自对整个世界命运的

沉思’。……施莱格尔已经认识到,反讽是‘对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唯有爱恨交织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认可’”^{[16]19}。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奠基人克尔凯郭尔则把反讽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和人类精神发展的一段历程提出:“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认为反讽是反抗人的悖谬性存在的一种力量,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回应,是人的主体性的表达与体现^{[2]184}。可见反讽也是人在把握世界的矛盾性及自身悖谬性的一种方式,是人们主体意识觉醒、对世界认识更

为深入的反映。《后悔录》的作者显然洞悉了其作品中“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因而才通过曾广贤的历史叙写出中国人的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

米克曾说,反讽的目的“也许在于获得全面而和谐的见解,即在于表明人们对生活的复杂性或价值观的相对性有所认识,在于传达比直接陈述更广博、更丰富的意蕴,在于避免过分的简单化、过强的说教性,在于说明人们学会了以展示其潜在破坏性的对立面的方式,而获致某种见解的正确方法。”^{[16]35}。由上述三个方面悖论情境的分析可以看出,《后悔录》的反讽目的应是达到了。

参考文献:

- [1] 罗传清. 在荒诞中寻找出路:论东西小说中的反讽[J]. 作家杂志, 2009(5): 14-15.
- [2] 赵毅衡. 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3] 汪正龙. 说反讽——对西方美学史上一个重要范畴的考察[J]. 人文杂志, 2007(3): 112-116.
- [4] 李建军. 小说修辞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17, 221-222.
- [5] 吴文薇. 当代小说中的反讽[J]. 小说评论, 1994(1): 75-79.
- [6]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11.
- [7] 童庆炳. 文学理论要略[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185.
- [8] [法]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538.
- [9] 余华. 兄弟(上部)·后记[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 [10] 谢有顺. 文学身体学[J]. 花城, 2001(6): 192-205.
- [11] 王小波.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的艺术[M]//艾晓明, 李银河主编. 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51-52.
- [12] 葛红兵, 宋耕. 身体政治[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46-47.
- [13] [法]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富成, 全志刚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44.
- [14] 东西. 后悔录[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91-292.
- [15] 吴雪丽. 时间暴力下的欲望叙事——评东西新作《后悔录》[J]. 理论与创作, 2006(2): 69-72.
- [16] [英]D·C·米克. 论反讽[M]. 周发祥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2: 19, 35.

Paradox of Human Nature in Absurd Era ——On Ironic Rhetoric in The Regrets

LIU Ying-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Regrets is a novel written by Dong Xi. It records its main character Zeng Guangxian's failure experiences of abstinence and lechery from 1960s to 1990s.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two times, this book describes a series of paradoxical situations, which achieves a great ironic effect. Zeng Guangxian could not resist physical temptation in abstinent time while in lechery time, he could stick to ethics. Hence, an obviously strong contrast between his good will and his punishment comes into being.

Keywords: The Regrets; paradox; irony; rhetoric

(责任编辑:李开玲)